

序

為紀念《新青年》雜誌於 1915 年出版，亦為了思考香港的青年問題——尤其近年香港青年的政治言行引發社會熱議的現象，我們在 2014 年香港政治環境波譎雲詭的時刻埋首研究，目的是利用回歸後積累下來的民意調查數據，梳理香港青年政治態度與政府管治等不同層面的變化，並於 2015 年完成初稿，爭取在年底出版，希望趕上《新青年》「百年紀念」的尾班車。

然而，在籌劃出版時我們察覺到，受 2014 年佔領運動失敗的影響，當時香港社會仍甚「情緒化」，青年尤其躁動未止，言行更趨激烈、「勇武」，包括萌生分離主義，若在那時作出階段性結論，恐怕言之過早。再者，政府對發起和帶領運動人士的檢控仍未有結果，市民對整個問題或未夠時間深思熟慮，所以我們決定延後出版計劃，給予時日讓事件沉澱，再作跟進調查，同時修改書稿、豐富內容。

一如預期，2014 年之後，無論整體社會或是年輕世代，政治態度呈現了巨大變化，大有激情過後一切歸於平淡的跡象，這「重回常軌」的趨勢清晰地反映在嗣後四年的民意調查上，讓人看到問題的後續發展與轉變，俾能提出更全面、透徹的分析。

到了今年，適值 1919 年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我們覺得這實在是更具意義的日子，因為一來《新青年》在 1915 年出版後，

影響了無數中國人，尤其激發了不少人的愛國情懷，以及對國家民族在內憂外患時刻應何去何從的思考，惟當中的「過激過急」曾招來批評，亦帶來傷害。二來是 2014 年的佔領運動，亦有人將之類比五四運動，藉以號召青年加入、呼喚社會覺醒，當中的「過激過急」同樣招來批評，亦帶來傷害。

正因如此，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我們提出一個歷史回顧與分析，扼要地指出，近代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因為國力急墜，招來外侮，一度瀕於民族覆亡，令平民百姓、知識分子、政商官賈，均吃盡苦頭，不斷思考救國強國之道。至於到底是「全盤西化式」的現代化，抑或是按照自身歷史、文化和現實環境的「折衷式」現代化，則屬兩條截然不同、並挑起最激烈爭議的道路。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不少發展中國家，亦如中華民族般飽受外敵侵略欺凌，在察覺到自身實力不如歐美後，渴求奮發自強，卻發現要徹底學習歐美、「全盤西化」，又會因種族、文化、歷史、宗教，甚至地理、氣候及環境等差異，不能硬套照搬，可「折衷式」變革亦困難重重，罕見奏效。反觀中華民族，由瀕於滅族亡國、一窮二白，最終憑着堅持改革開放，走出自己的發展道路，應可為眾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一些參考。

本書的核心觀點亦建基於此，因為 2014 年的佔領運動，既有支持者呼應全球化民主浪潮，奉歐美模式為「國際標準」的一面，亦有反對者主張秉持中華民族發展經驗，筆路藍縷以闢蹊徑的一面。香港過去其實亦沿着一條特殊道路前進，並取得可觀佳績。香港青年群體在當時的思考與行動，既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亦深具學術研究價值，他們的家國觀念急轉直下，尤其帶出另一些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亟待跟進。

在本研究中，我們根據回歸 20 年來的民意調查實徵數據，勾勒年輕世代的政治態度變化趨勢，檢視態度丕變的社經政治脈絡，並辨別年齡、時期及世代因素對政治態度的獨立影響，

研究過程中難免碰到各種各樣問題，包括調查數據未夠全面、分析角度未夠周延、學術根底未夠扎實等。為此，我們雖策駑礪鈍，求是求真，還是無法排除秕糠錯漏，但願讀者朋友有以教我，不吝賜正，令我們日後的研究得以寸進。

這一研究項目最終能夠完成，實有賴眾多師長、友濟、同事及機構給予寶貴意見、支持和協助，我們特別感謝我所所長張妙清教授無間的鼓勵與提攜，我倆恩師黃紹倫教授和劉兆佳教授的耳提面命與高情厚愛。同事沈國祥和葉天生執行歷年調查、黃子為和鍾雪怡協助分析數據、梁月蓮和陳韻晴負責文稿校對，我們不勝感激。最後，眾多市民撥冗接受訪問，在此謹誌謝忱。

1 青年與社會

在中國，1915 是帝制推翻後不久的年頭，以陳獨秀為首的一班青年學者，在該年的 9 月 15 日於上海出版了《青年雜誌》，其後易名《新青年》，宣揚民主和科學，當時稱為「德先生」和「賽先生」，並呼喚社會變革。該刊物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社會極大的迴響，成為了推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堅，被視為啟蒙人民思想、帶動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魏知信，1987）。其後，蔡元培形容《新青年》為「時代之急先鋒」，胡適則稱之為「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劃分一個時代的刊物」。¹

顧名思義，《新青年》的目標是年輕人，提倡的是新思想、新觀念和新作風，與迂腐、古舊、墨守成規、阻礙時代前進的事物或意識劃清界線。陳獨秀在雜誌創刊號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精簡地說明了青年的特質「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硯，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在推動社會發展上的重要性「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為社會帶來新陳代謝；社會若不能遵守此自然法則，以至「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亦必如人身般走向衰亡（陳獨秀，1936:1）。

1. 這些評語，引自蔡元培和胡適在 1936 年《新青年》重印本第一卷開篇的題詞。

政區基本法》（簡稱基本法）的規定，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變，「馬照跑、舞照跳」，但部分民眾的生活、經歷和機遇，難免發生不同的變化。回歸以後不久，環球經濟風高浪急，香港又遭遇前所未見的非典型肺炎（SARS）疫症襲擊，眾多香港人的生活，驟然受到衝擊，因而發出怨言，甚至懷念過往。而年輕一群——我們姑且籠統地稱之為「香港新青年」——因對過去的殖民統治經歷模糊、體驗不深，理應較易在新時代昂首闊步，擁抱未來，這是不少人對香港新青年的想像或期望。

若回顧香港特區成立以來的社會運動，年輕人的角色無疑舉足輕重。在連串觸目的集體行動如 2006 和 2007 年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2010 年反高鐵、2012 年反「雙非」、反國教、2013 年「光復」旺角、反大陸化、2014 年驅蝗行動、香港學界大罷課、佔領運動，以至 2016 年旺角騷亂（或稱魚蛋革命）之中，香港新青年都成為了領導或骨幹，號召群眾時不遺餘力，挑戰政府時詞鋒銳利，針砭時弊時慷慨激昂，在在引起社會的關注，成為了海內外傳媒焦點。

更牽動各方神經的是，香港新青年對社會的不滿，似乎比其他更強烈，他們對政府、保守建制派、傳統民主派、既得利益者，以至資本主義等主流價值，一概不滿；在爭取權益時，似亦不惜與大眾的核心價值背離。例如年輕人帶領佔領運動，為理想奮鬥、為民主犧牲，本贏得各方支持，但後來卻因其言行被猜疑危及法治此香港核心價值而流失民心，如有學生在電視上宣稱：「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法律只佔次要地位」，時任立法會議員湯家驊（2014）隨即撰文回應：「聽了這番話，能不令畢生致力維護法治的人搖頭嘆息？」又如香港大律師公會（2014）雖不認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簡稱「831 決定」），但亦發表聲明，駁斥運動領袖號

召群眾集體違抗法庭命令，認為法治「對香港來說，肯定是一隻不能摔破的蛋。今法治危如累卵，破在旦夕，倘或失陷，運動初衷，如之奈何？」

尤有甚者，部分年輕人在參與集體行動時，或表明揚棄「和理非非」（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傾向勇武抗爭；或在示威場合高舉港英時期旗幟，表達對殖民統治「舊日好時光」的緬懷；或在國家認同上，倡議「反陸抗中」，主張香港「民族論」、「城邦自決」、「獨立」，如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宣稱「港獨」是「一條可行的出路」（香港電台網站，2016），學生會刊物《學苑》以〈香港青年時代宣言〉為題，提出「香港成為受聯合國認可的獨立主權國家」的訴求，並發表其校內民調結果（受訪學生共 385 人），表示在中央政府不承認香港公投表決「香港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情況下，會投贊成票者，由 2014 年的 37% 增至 2016 年的 61%，而支持武裝革命追求港獨者，亦達 31%（何曦偉，2016:42-43；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2016）。

為何本應較能適應新時代，沒太大歷史包袱，亦對殖民統治印象模糊的香港新青年，在回歸後對政府施政、社會問題、經濟發展或環境保育等更為不滿？他們為何會流露出今不如昔的強烈情感，甚至緬懷殖民統治？對香港社會及政治發展，為何出現如此高度的關注？對國家的觀念或與內地的互動，何以形成如此負面的情緒？這些變化，能否歸因於年輕人對民主發展的較強烈訴求，或對社會流動的較嚴重不滿嗎？

本書運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 1998 至 2017 年間進行的隨機抽樣民調所得，² 闡述回歸以來年輕一代對香港及內地的態度與看法，嘗試探討影響這些觀感的原因。

2. 此系列民調每半年進行一次（從 2017 年起改為每年一次），

青年的定義與特質

在展開分析之前，讓我們先回顧學術界有關青年與社會發展的一些討論。首先，就何謂「青年」，需要下定義、劃界線。驟眼看來，我們對於青年，應該不會感到疑惑或陌生，因為這是人生的必經階段，但原來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和不同組織，對青年的界定，頗有不同。在古代中國，10歲以下稱為「幼」，10至19歲稱為「童」，20歲時稱「弱冠」，舉行冠禮後算是成人（陳映芳，2007:4），到30歲是「而立」，然後是我們耳熟能詳的40歲「不惑」和50歲「知天命」。從上述分類不難看到，在古代中國，並沒有「青年」這個人生發展階段的概念。

就算在西方，據 John Gillis (1981) 的研究，中世紀以前的歐洲社會，也沒有現今社會所說的「青年」觀念，而是簡單地劃分兒童期和成年期，沒有一個處於中間階段的青年期。在其他社會，亦存在大體相同的情況 (Angvik and Borries, 1997)。換言之，「青年」這概念並非純粹生物性的，而是帶有濃烈的文化性及社會性，因時因地而變，而且是進入現代社會之後才興起的。

在現代中國社會，青年的年齡界線到底如何劃分呢？根據《漢語大詞典》有關「青年」的條目，人在「十五六歲到三十

截至2017年，共進行39次。調查總體是年滿18歲、操粵語或普通話、家中裝有固網電話的香港居民。

調查採取兩階段的機率抽樣：首先是以最新的住宅電話號碼為抽樣框架（末二或四碼採隨機方式選取），再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隨機抽出號碼；其次是成功接觸住戶後，按「即將生日原則」抽取一位合資格人士接受訪問。

每次調查成功訪問約800人，回應率約為40%。若將可信度設於95%，推論百分比變項時，最大可能樣本誤差約在±3.5個百分點以內。

歲左右的階段」是青年（羅竹風，1993:515）。國家統計局將15至34歲界定為青年（四川省統計局，2015），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所下的界線，是14歲以上、28歲以下（中國共青團，2013），而中國青年節法定假期則規定為14至28歲。也即是說，在同一國家內，有關青年的界定仍會各有不同。

世界各地對青年年齡界線的劃分，亦不盡相同。舉例說，聯合國在1985年給青年劃定的年齡界線為15至24歲，但實際操作時，又會因應成員國本身情況，採用15至35歲的尺度（United Nations, 2013）。在香港，政府統計處（2018a）給青年定下的年齡界線為15至24歲，但「十大傑出青年選舉」，年齡規定則是21至40歲（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2018），法律上，將年滿18歲視為成年，既可獨立行使政治權利（例如有權投票），亦要承擔法律責任。在學術界，有人將青年的界線定於13至25歲（Kehily, 2007:16），亦有人將之定於10至30歲，或是12至35歲（Nilan and Feixa, 2006:1）。也就是說，無論國際社會或學術界，對於青年的年齡界線，其實並無普及的標準。此外，對於青年究竟用甚麼詞語稱呼，也不一而足，以英語為例，較常用的便有 adolescence、boyhood、teenager、young person、youngster、youth 等。這些詞語對青年到底屬於哪個年齡組別，其實並不清楚。

為何如此參差不齊、沒有統一口徑呢？有學者指出，人類的成長雖受先天的生物或荷爾蒙等因素影響，但後天的文化和社教化效應同樣巨大，不同社會因應自身環境或需要，就哪個年齡階段屬於青年也就作出不同劃分。因此，對青年議題的理解，不能脫離其社會或文化背景（Montgomery, 2007）。

在民眾心目中，青年大都處於求學及未婚階段，或是剛踏足社會，就算有部分已經結婚，多數還未有孩子，所以一般而言仍不是家中經濟支柱，既未能自置居所，亦不用承受太大的養家活兒負擔。由是之故，青年給人的感覺是尚帶稚氣、思想

單純、入世未深，以及有欠穩重。由於他們較能自在地生活，於是亦較能率性而行，甚至為追求理想而桀驁不羈、離經叛道，而社會對之也傾向體諒包容，認為那是個人成長過程中的正常行為 (Winnicott, 1965)。

社會嘗試對青年的角色或形象定型，其實反映了青年所處的人生發展階段與別不同。簡單來說，青年階段夾在童年 (childhood) 與成年 (adulthood) 之間，往往被認為乃成長的「過渡階段」 (transitional period)。³ 即屬於臨時性質——既較不穩定，又較波動 (Heinz, 2009)，甚至帶有反社會、反建制的色彩。對於這一現象，學者從不同角度所作的形容或分析，可供參考。

心理學家 Stanley Hall (1916) 認為，處於人生旅程「過渡階段」的青年，乃無需喝下任何含酒精飲料，卻能維持酒醉狀態的一群，他引用柏拉圖的話，指那是一種精神醉酒 (spiritual drunkenness) 現象，充滿激情又易於衝動；箇中原因，相信受成長期荷爾蒙變化影響，令青年較情緒化，思想觀念或行為舉止均較易表現得不穩定和波動。他的結論是青年不會永遠年輕，隨着年齡漸長，青年最終必然走向成熟，擺脫稚氣，然後成為大眾一員。

人類學家 Arnold van Gennep (1960)，則以「通過儀式」 (rites of passage) 的概念描述青年的特質。他指出，青年不再是童年，又未達至成年，是一個在中間的闕限階段 (liminal period)，角色和身分未完全確立，都有待轉變。在不少社會或文化中，處於這階段的青年，多被認為性格尚未成熟，表現總

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甚至讓人覺得舉止反叛怪異，時常違規犯禁。只有當他們完成某些人生考驗，經過某種儀式之後，才能獲得「新生」，建立本身固定的身分，融入社會。

心理學和人類學頗一致地認為，青年乃人生發展過程中的過渡階段，這「人生階段既具重大社會作用，又屬心理上十分複雜的事情」 (Kehily, 2007:16)，最終必會在逐步成熟時由波動走向穩定，與主流社會融為一體。雖則如此，處於這階段的青年，由於自覺不再處於童年階段，但尚未達至成年階段，心理或情緒上有所不安和緊張，出現 Erik Erikson (1968) 所說的「認同混淆」 (identity confusion) 現象，Erikson 還認為，青年時期是個人價值觀念形塑和性格確立的重要階段。

更準確地說，青年不是一個靜止不變的概念，而是一個流動變幻過程的印記 (Wyn and White, 1997)，它記錄了年輕人尋求自我身分、爭取社會認同，並努力建立個人形象或地位的過程；又見證了他們嘗試衝破舊觀念、舊體制、舊作風和舊人事，從而建立和肯定自我的過程。青年時期的成長環境，對其價值觀念和人生目標，具有重大的影響。

青年從依靠父母，到走向獨立；從帶有稚氣，到走向成熟；從角色模糊，到獲得確定，在此過程中，青年或會做出挑戰傳統、衝擊常規的行為，或會提出新觀點、新遊戲規則，在這個破與立的過程中，容易招來既成制度或價值支持者的反擊，認為他們的言行不切實際、過於理想，或是矯枉過正、不負責任。不過，大眾往往因欣賞青年的赤子之心而多可少怪。

這是一個從破到立、尋找主體性、建立自我身分的過程，關鍵是年輕人能在跌跌撞撞的經驗中，拓展視野，增加歷練，成功踏進成年階段，融入並組成主流社會。

社會與價值觀念的變遷

當碰到青年對社會表達諸多不滿，或作出反叛行為時，成

3. 針對此點，有學者提出「成人初顯期」 (emerging adulthood) 的概念，指這階段的年齡約介乎 18 至 30 歲，屬於一個靈活的階段，帶有俗語所說的「未定性」意味 (Smith, 2007; Arnett, 2015)。

年人經常說：「我們都年輕過，明白你們的憤懣，到你們長大了，便會知道這個世界比你們想像的複雜、艱難。」其意是肯定生命週期 (life cycle) 的影響：隨着時間流逝，青年年紀漸長、閱歷漸豐，進入結婚生子的成年階段，需要負起家庭重擔和面對生活壓力，到了此時，過往的理想主義、社會不滿、反叛行為，自然會逐漸消散 (Braungart and Braungart, 1986)。

現實情況是否如此簡單呢？近年來，嬰兒潮世代、X、Y、Z 世代、網絡世代、數碼世代等稱謂陸續出現，以表達不同世代人士於成長背景、群體特徵、消費模式和價值取向的差異。⁴

「世代」一詞，主要指相近時期出生，並擁有相似生活經歷和特質的近齡群體 (cohort)。不同世代之間，價值觀念和人生追求何以截然不同？不同世代之間的矛盾，是否可以形容為「世代之爭」？中外社會近年的群眾運動，為何經常出現青年的身影？有些運動甚至由他們策劃、組織和帶領呢？這背後反映了怎麼樣的社會現象？

在現代社會，「追求幸福」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但對於幸福的意義，以及達到幸福的途徑，卻受主觀影響，看法不一 (張燦輝、尹寶珊, 2006)。不同時期成長的群體，會因應社經和政治環境，而形塑出不同的價值觀和人生目標。Ronald Inglehart 在這方面的研究，很值得我們參考。

Inglehart 透過對西方發達社會的實徵研究，並受到心理學家 Abraham Maslow 的需求階序 (hierarchy of needs) 理論啟發，⁵

認為一個人的需求有價值優先次序，他以匱乏 (scarcity) 和社教化 (socialization) 兩項假設為支柱，⁶ 申論在持續富裕與安定的社會，當現代化到達報酬遞減之際，便會接上可被稱為後現代化的發展軌迹，社會價值觀從物質主義 (materialism) 往後物質主義 (postmaterialism) 轉移，而文化價值觀的轉型，主要循世代的更替來完成。簡言之，不同年齡層所追求的目標或夢想有所不同，對人生和社會問題的看法亦有差別。若在成長時期經歷過動盪不安、物資匱乏，甚至生活無以為繼、安全受到威脅，成年後會較強調物質主義，即較重視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與維持社會安定；若成長於社會穩定、經濟繁榮、衣食無缺的環境，成年後的基本價值觀會較傾向後物質主義，即雖不會刻意貶低物質的重要性，但更熱衷追尋人生中更高層次的需求，包括自主自由、自我實踐、社會公義、政治參與、民主社會、環境保育等 (Inglehart, 1977; Abramson and Inglehart, 1987)。

Inglehart (1990) 舉出具體例子，指成長於二戰及之前的世代，與成長於二戰結束後即 1950、60 年代的嬰兒潮世代很不一樣，後者物質資源雖仍缺乏，但經濟已逐步復蘇，社會提供了很多發展機會。到了 1970、80 年代，物質豐盛、社會安定、教育普及、科技日新月異，這一代成員的人生目標、價值觀與世界觀，又出現顯著的不同。隨着社會不斷前進，加上世代的更替，先進社會已由過去高舉物質主義旗幟，逐步轉為崇尚後物質主義，人民的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由此引申的問題，是信奉物質主義的世代，與崇尚後物

4. 對世代的劃分方法眾多，劃分的目的和商業推廣有一定關係 (Schroer, 2004; Parment, 2012)。

5. Maslow (1954) 指出，人的需求是有階序差別的，其結構猶如金字塔。最先必須獲得滿足的，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然後依次是安全、愛與歸屬、自尊等需求，最高層是自我實現需求。近年的相關實徵研究，可參閱 Tay 及 Diener (2011)。

6. 匱乏假設認為個人的價值取向反映所處的社經環境，相對而言，較易得的事物會被賦予較低的主觀價值。社教化假設則認為成年人的基本價值觀是在成長的階段形成，成年後不容易有顯著的變化。

質主義的世代之間，因價值觀與信念不同，對社會、政經發展方向問題意見相左、立場各異，出現彼此爭奪的情況。後物質主義因重視自主、自由、民主等價值而具有「親民主化」的性質，故與民主化的進程息息相關（Inglehart, 1997:210; Welzel and Inglehart, 2005; Welzel, 2011）。為了表達其政治訴求，達至其政治理想，後物質主義的信奉者利用示威、抗議、佔領建築物、堵塞交通要道，或在互聯網上發動攻擊等非傳統抗爭方法，衝擊建制、挑戰權威，是西方社會近年常見的現象（Abramson and Inglehart, 1995; Spehr, 1997; Quaranta, 2015）。在香港，根據前述《學苑》的2016年校內民調結果，認為在參與政治活動和表達意見時，不需要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者，由2014年的21%增至48%（何曦偉, 2016:43）。

由於信奉物質主義者多屬年長世代，信奉後物質主義者多屬年輕世代，他們的矛盾與爭鬥，常被視為「世代之爭」，不但成為媒體與社會高度關注的現象，亦是各地政府相當重視的議題（張妙清等, 2017）。

香港在二戰後的社經和政治環境，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種可能擴大世代差異的因素競相發展。在日本侵華、國共內戰等烽火連天時期出生的世代，與戰後步入社經重建時期出生，或是1960、70年代社經蓬勃發展時期出生，乃至1980年代及其後物質豐盛、社會安定、教育普及、科技革新，以及回歸中國後出生的群體，這幾代人的成長環境，成年後的精神面貌和行為模式，自然不盡相同。年長世代抱持物質主義，年輕世代轉向後物質主義的趨勢，亦日益明顯（蕭新煌、尹寶珊, 2004; Wong and Wan, 2009; 黃子為、趙永佳, 2016）；不同世代各有其偏重的價值取向和觀點角度，面對嶄新事物、權衡利害得失，以及作出取捨決定時，更容易觸發世代矛盾與爭奪。

劇變時代下成長的香港新青年⁷

如前所述，無論國際社會或學術界，對於何謂青年，並無統一的標準。本書按年齡界定回歸後成長的香港新青年，即在回歸當年未滿18歲的人士。這界線與社會將年輕一代稱為「八十後」、「九十後」（即1980年後出生），並沒二致。

香港回歸後成長的新青年，在個性或價值觀念上，和殖民地時期成長的年輕人，有何不同呢？他們所經歷的成長環境，有何特質呢？現在社會上紛紜多變的因素——尤其是剛冒起但已觸動無數人神經的「中國因素」——對他們有何影響呢？

總括而言，新青年的成長時期，正值香港社會已日趨富裕，物質相對豐盛，經濟及家庭結構同時開始轉型，工業逐步外移，科技則突飛猛進的時期。他們成長的年代，恰好也是本土文化意識生根茁壯，政治參與、議政論政風氣日漸成熟的年代，因是之故，新青年會更強調本土身分和本土文化，更重視本地社會的發展。此外，在1980年代，中英兩國正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因而為香港的政治及社會帶來前所未見的轉變。這樣的社經和政治環境，直接或間接地塑造了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念和政治意識。

值得關注的是，富裕的環境亦意味經濟成熟，發展的動力、空間和機會或不及從前，加上全球化浪潮帶來全方位的激烈競爭，時下青年若非擁有與生俱來的本錢——如天賦出眾能力或家境優越等條件，否則不易在社會中取得突破。下文將利用官方統計，勾勒香港在上世紀下半葉——尤其1980年代起——所出現的巨大社會變遷，從而說明在那個時代出生和成長的青年，如何孕育並形成他們的時代特質，而他們離開校門，走進社會後，又會面對何種時代的局限和挑戰。

7. 本節修訂自鄭宏泰、尹寶珊（2016）。

在物質豐盛但貧富懸殊的環境中成長

年輕與年長世代在人生經歷和價值觀念的差異，主要基於物質條件大幅改善。從數據看，1940年代末，香港受地緣政治和冷戰格局的影響，出現了資金和人力資源湧入的情況，加上西方世界的關稅優惠等，開始進行戰後的經濟重建，踏上工業化道路，經過約30年的持續急速發展，到了1980年代，已到達相對富裕的水平。

以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為例，香港在1961、1971和1981年各為2,353、6,596和33,487港元（政府統計處，2018b:表030），20年間，增幅高逾13倍。與其他社會相比，香港在1980年時為5,700美元，不但遠高於台灣（2,389美元）及中國內地（195美元），亦迫近西班牙、愛爾蘭、新西蘭等西方國家的水平。到了1990年，香港的人均GDP已倍增至13,486美元，進一步拉近與歐美發達國家的距離（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8; World Bank, 2018），⁸反映香港的整體生活水平不斷提升。

香港新青年的成長環境，與在戰亂和匱乏中求存的年長世代，近乎天壤之別，他們對經濟成果和物欲滿足的重視，自然不如年長世代。在相對富裕環境中成長的一代，雖不需擔心生活朝不保夕，更不必蒙受戰亂災禍，然而，「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貧富懸殊除影響基層民眾的生活質素和機會外，也會加劇社會矛盾和分化，尤其影響民眾對公平和正義

的看法，導致社會問題叢生、民粹主義上揚、經濟成本增加、政治風險擴大等後果（World Bank, 2005; OECD, 2008; 王卓祺、尹寶珊，2012）。

在新青年成長的時期，收入差距擴大和相對貧窮惡化是全球性的趨勢，香港的情況亦然。1965至1990年間，香港的經濟發展被世界銀行譽為「東亞奇蹟」，即既取得驕人的增長，民眾亦能共享成果（World Bank, 1993）。其後，香港融入區域以至全球經濟體系，內部結構向知識型經濟轉型，經濟持續增長，2017年，人均GDP達46,194美元，居亞洲前列（World Bank, 2018）。但「快速增長+相對均富」的發展效果已成歷史，貧富不均的程度屢創新高，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由1986年的0.453升至2016年的0.539（財政司司長辦公室，2017:91），嚴重程度居全球發達經濟體首位。⁹

貧富日趨懸殊反映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根據我們的民調，認為香港貧富差距問題嚴重的比例，不但居高不下，不同世代對收入分配的問題感，更出現分歧的變化：在2005年之前，年輕世代的問題感一直偏低；但在2008年後，青年的看法日益負面，中年人是相對平穩，年長者卻顯著下調，致使年輕與年長世代的觀感背道而馳（鄭宏泰、尹寶珊，2016:65-66）。換言之，新青年雖在相對富裕的環境中成長，但社會不公是滋生民怨民憤的溫床，年輕世代對貧富懸殊的負面觀感，明顯較年長世代強烈，彼此的分歧呈擴大之勢。

8. 1990年，香港的人均GDP已將一些歐美國家如葡萄牙（7,885美元）和希臘（9,600美元）比了下去；並拉近與新西蘭（13,670美元）、西班牙（13,767美元）和愛爾蘭（14,048美元）的距離；但仍落後於英國（19,095美元）、意大利（20,757美元）、荷蘭（21,019美元）、法國（21,691美元）、德國（22,220美元）和美國（23,954美元）（World Bank, 2018）。

9. 2017年，在政府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高齡津貼和學生資助等措施），處於官方貧窮線下的貧窮人口仍達100.9萬，貧窮率為14.7%（長者、單親和新移民住戶，更各達47.6%、34.3%和30.2%）（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8:52）。

在產業轉型但增長放緩的變化中生活

中國內地於 1970 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吸引不少香港商人投資，此舉既為內地經濟注入活力，又令香港經濟迅速轉型，其中以第三產業不斷壯大、工業北移最為明顯，並牽動就業市場的結構轉變：大部分職位由體力勞動的「藍領」崗位，轉為文職的「白領」崗位。以 1950 至 1970 年代作為經濟骨幹的第二產業為例，其就業市場的佔比，1981 年時還是 48.5%，但之後持續下跌至 1991、2001、2011、2017 年的 32.8%、16.2%、11.4% 和 11.7%；同期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比例則由 50.2%，上升至 66.2%、83.4%、88.5% 和 88.2%（政府新聞處，2002:35, 2012:42, 2018:103; 政府統計處，2018b）。

經濟轉型表示新青年的成長環境，不但物質條件較優，亦適逢就業市場結構劇變。在工業式微的年代，年輕世代投身社會，多不需步年長世代的後塵，加入體力需求大、辛苦沉悶、收入微薄、地位低下、保障不足兼前景欠佳的藍領工作；反而較易晉身白領或專業階層，享有較好待遇和社會地位。由於工作環境較年長世代來得舒適，保障及權利大有改善，新青年對人生，以至社經事務的觀感和期望，自然和上一代不同。

但與此同時，香港經濟的發展動力卻呈減退之勢。以人均 GDP 按年變動的百分率為例，在 1976 至 1997 年間，共 18 年錄得雙位數的增長，顯示經濟蓬勃發展；但在 1998 至 2017 年間，不但有六年錄得負增長，反彈或增長的幅度亦明顯放緩（政府統計處，2018b: 表 030），基本格局可說是「橫向發展」。

我們的民調發現，民眾對香港經濟前景的信心波幅極大，近年的趨勢除持續惡化外，不同世代更呈現相異的變化：在 2009 年之前，對經濟前景抱悲觀態度的年輕世代比例，一直大幅低於其他世代；其後卻愈趨接近，在個別年分，甚至比其他世代更看淡前景。此外，當被問到「你目前的生活水準與你的努力比較，是公平還是不公平」時，不同世代的感受同樣呈現

顯著的差異和走勢：在 2008 年之前，自覺不公平的年輕世代比例，大都低於其他世代，但從 2009 年起，年輕世代的不公平感不但有增無減，觀感更較其他世代強烈；年長世代的觀感，則與年輕世代背道而馳（鄭宏泰、尹寶珊，2016:66-67）。

當民眾看好社經和政治前景時，會傾向安於現狀，而為了維持現狀或規避風險，會選擇較保守的政策，支持執政者及其盟友；但在看淡前景或面臨威脅時，則傾向尋求改變，接受風險較高的政策變革，支持反對陣營。過去十多年經濟緩滯的格局，自然影響了民眾的薪金收入，青年踏足社會後由於經驗不足，縱有較高學歷，收入卻未如理想，阻礙了他們改善生活尤其渴望置業的綢繆，相信這是直接或間接令青年感到挫敗沮喪的原因。年輕世代由對香港經濟前景和社會公平抱較正面觀感，轉為近乎最悲觀和最負面的一群，他們的社經和政治行為，自然會出現相應的變化。

在本土意識抬頭時孕育香港情懷

1980 年代，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及本土文化意識日漸成形，對年輕世代帶來明顯的影響。在 1970 年代之前，非本地出生人口所佔比例甚高，這些移民多視香港為「臨時」居所，「難民心態」（refugee mentality）強烈，內心總有一股年老返鄉、落葉歸根的念頭（Hughes, 1968; Wong, 1988）。但隨着經濟高速發展，物質條件不斷改善，加上本土文化尤其粵語流行曲、電影和電視的興起，居民對香港的歸屬感大為提升（馬傑偉，1996; 吳俊雄，2001）。

與物質及社會意識相比，更為核心的轉變，是殖民地政府於 1972 年更改實施百多年的移民政策，非本土出生人士居港滿七年，即可享有永久性居民身分的法律保障（鄭宏泰、黃紹倫，2004），「飄泊無定」的感受開始消散，「難民心態」也就不會延續給下一代，祖籍觀念日漸淡化。到了 1980 年代，這種扎

根的意識已完全建立，和上一代相比，新青年具備了截然不同的身分認同和社會意識。

對新青年影響尤深的是，在 1980 年代前，香港人和中國人認同在政治意義上的差異並不強烈，中國人認同不必指涉政治實體，較多是認同文化和歷史的中國或華人。回歸定案後，集體想像的內涵產生質變，兩種認同之間出現了矛盾性和排他性。本土認同的核心，在於凸顯香港的物質豐盛、人權、產權及自由保障，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認同，變成了富裕與貧窮、先進與落後、城市與鄉村、開放與封閉、自由與壓制、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等的二元對比。而香港與內地人民在身分上的差異，更獲得了基本法的保障。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回歸後的香港人雖已屬中國人，但擁有司法獨立、財政、稅務與貨幣自主的權利，身分證及護照的使用，亦與內地不同。此等措施，無論在情感或現實層面，均擴大了兩地居民的分別。此外，由於公民身分在法律上的區隔，香港人也無從積極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制度安排，令「香港人」從一個社會文化群體，變成一個政治群體，也為新世代理所當然地認同本土、忽略甚至排斥國家認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強世功，2010；鄭宏泰、尹寶珊，2014b；尹寶珊、鄭宏泰，2016）。

在家庭規模縮減與教育機會擴張中接受栽培

隨着經濟轉型和生活改善，家庭結構發生蛻變，普及教育也得到落實，令年輕世代在家庭中成為寵兒，教育機會大升。在家庭方面，從 1980 年代開始，香港的生育率和平均住戶人數均急速下滑，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由 1971 年的平均每名女性育有 3.46 名嬰兒，持續減少至 1981、1991、2001、2011 和 2016 年的 1.93、1.28、0.93、1.20 和 1.21，大幅低於生

育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 fertility）；¹⁰ 同期間，平均住戶人數亦由 4.5 人，下降至 3.9、3.4、3.1、2.9 和 2.8 人（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92:14；政府統計處，2012a:65, 2017a:75, 2018b:表 004）。

在家庭規模急速縮小的同時，普及教育得到落實，令社會的教育水平大幅攀升，年輕世代接受教育的機會，明顯比年長世代高很多。以年滿 15 歲人口的學歷為例，在 1971 年，未受教育或只有幼稚園程度的有 22.7%，達小學、中學，以及專上程度者，各佔 44.1%、28.8% 和 4.4%；到了 1981 年，相關比例已是 16.2%、34.1%、43.0% 和 6.7%；之後，教育水平提升得更急，2016 年的比例是 5.4%、14.6%、47.3% 和 32.7%（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92:199；政府統計處，2017a:48）。學歷的大幅提升，主要集中於年輕世代。然而，近年的高等教育擴張，亦源於非政府直接資助的學額大幅增加，學位種類混雜，監管程度參差，質素更是良莠不齊。

家庭規模下降與年輕世代教育水平提升，自然影響青年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角色與關係。舉例說，子女人數銳減，顯示傳統社會的多子多福、天生天養觀念不再，兄弟姊妹間既有爭吵、又有合作互動的環境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貴精不貴多和萬千寵愛在一身。父母高度重視子女的成長和教育，對子女的關愛、照顧和期望顯著增加，令年輕世代成為家庭的焦點。這樣的成長環境，對他們的性格發展、價值觀念、家庭與人際關係網絡，以至肩負的期望和壓力，自有一定影響。

學歷大幅提升，又會影響年輕世代在各方面的發展和機會，

10. 總和生育率指每名女性若在生育齡期（即 15 至 49 歲）經歷了一如該年的年齡別生育率（age specific fertility rate），其一生中活產子女的平均數目。低於更替水平一般指總和生育率低於 2.1，不足以維持穩定的人口結構。

包括謀生、接收資訊的能力，以及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興趣。但是，在現今社會，學歷上升已不一定帶來相應的生活質素改善，或是社會向上流動，難免令青年產生各種各樣的負面情緒（鄭宏泰等，2016）。

在樓價高企中追求個人生活空間與成家立室

大都市多吸引移民湧入，令人口高度集中，並因面積有限、土地有價，容易出現房地產難以配合居民所需的問題。若加上資金湧入及投放到物業市場，會令房地產變成投資產品，房屋問題更趨複雜，亦更難解決。

香港雖日趨富裕，但住屋一直是頭號的民生問題，年輕世代對樓價高企、公屋短缺、面積狹窄等問題，相信更有「切膚之痛」，因他們踏足社會後，自然渴望不再依賴父母，可以獨立自主，擁有個人生活空間；成家立室與生兒育女，也會刺激青年自置物業的意欲。

可是，工資增幅與樓價飆升之間卻總是差距巨大。以回歸後 25-29 歲青年就業收入與中等樓價的轉變為例，可清楚地看到，青年的收入基本上是停滯不前、住房價格卻大幅飆升的趨勢：在 1997 至 2017 年間，該組別青年的就業收入中位數由 11,000 港元升至 16,000 港元，私人住宅樓價僅因亞洲金融風暴而短暫下調，令置業負擔比率由 5.14 輾轉上升至 8.16（政府統計處內部數據；差餉物業估價署，2018）；¹¹ 換言之，在 1997 年，一位 25-29 歲青年要用 5.14 個月收入，才能買得一平方米的住房，至 2017 年更要耗盡 8.16 個月薪金。

對不少家庭或個人而言，置業供款或支付租金，實佔了收入的很大比重，回歸後，25-29 歲青年的失業率多低於 5%（財

11. 置業負擔比率按九龍區 40 平方米以下私人住宅平均每平方米售價計算。

政司司長辦公室，2016:77)，就業收入亦有一定增長，但與樓價持續飆升相比，則有雲泥之別，因而加重其生活負擔。對於渴望自立或結婚的青年而言，感受相信更為沉重。看着緩慢而微薄的薪金增長，再面對不斷破頂的樓價，他們難免會感到失望與不平，覺得置業夢難圓，因而對政府、財團、既得利益者，甚至社會產生不滿情緒。

在政治爭拗與民主浪潮中耳濡目染

中英兩國在 1980 年代開展的主權問題談判，對年輕世代的思想和意識帶來重大影響。從開始談判，到治權移交，雙方一直爭鬥不絕（鍾士元，2001；魯平，2009；張春生、許煜，2012），種種明爭暗鬥，以及香港無權參與，在傳媒的報道和渲染下，影響了新青年對香港，以及對中國政府或內地的看法和想像。簡單來說，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從封閉狀態和一窮二白走向改革開放，各方面充滿變數，香港則富裕而安穩，自由開放，香港人對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難免心存猜疑和抗拒。談判期間，英方在談判技巧、引導輿論的表現，每多將中方比了下去，於是，也拉闊了年輕世代與中國政府的距離。

此外，英國對香港長期採取「去政治化」政策，對香港人議政、論政和參政的空間多加抑壓，如維持封閉的政治體制，¹² 港督由英國委派，議員則為官守或委任（Miners, 1998），自 1940 年代末起，更多次修改和制定法例，限制政治活動，加強規管傳媒與控制社會。¹³ 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下

12. 時任民政司黎敦義（Denis Bray）於 1980 年英聯邦議會會議致辭時，便說香港「看起來像現代都市，但它的憲法則更像是一件維多利亞女皇朝代製造、經小心保存遺留下來的殖民地體制古董」（黃宏發，1984:159）。

13. 如 1948 年的《公安條例》和《教育（修訂）（第 2 號）條

生活的香港人，大都不熱衷於參與公共事務，更遑論民主鬥爭 (Hughes, 1968; 劉兆佳, 2014)。

但是，到了1980年代，因應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港英政府終於作出重大改變，1982年在地區層面推行有限度的議席直接選舉，1991年實行立法局的部分議席直接選舉。¹⁴自此，香港才出現民主選舉活動和討論；與此同時，政府又鼓吹新聞自由，加速修改或撤銷用於箝制新聞的法例。¹⁵推行民主選舉和擴大言論自由，均讓年輕世代獲得了與年長世代迥異的成長空間、經驗與期望。

「六四」事件對年輕世代的影響亦值得關注。在持續不斷的紀念活動中，年輕人是薰陶的對象，希望能薪火相傳，將平反「六四」、追求民主的理想傳遞下去。在新青年心目中，北京學生反貪腐、求民主的行動，是出於為國為民的赤誠，鎮壓成為不少人心坎中一道難以癒合的傷口，激發他們對中央政府的不滿和不信任，這對年輕世代的政治態度、社會意識，乃至個人的思想、價值和觀念等，有不容低估的影響。直至佔領運動後，年輕人的本土意識急速上揚，始出現「悼念經已走到盡

例草案》、1949年的《入境者管制條例》和《社團條例》、1951年的《刊物管制綜合條例》等便是例子 (Legislative Council, 2018)。

14. 1982年區議會共有490個議席，其中132席(26.9%)由直選產生；1991年立法局共有60個議席，其中18席(30.0%)由地區直選產生。
15. 例如《1986年刊物管制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是旨在廢除所有與管制及查禁本地報刊有關的條文；《1988年公安(修訂)條例草案》，是旨在廢除禁止刊登可能引起輿論恐慌或擾亂公安的虛假消息的條文；1991年制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規定納入香港法律，令言論自由獲得更大的法律保障。

頭」、「六四是鄰國的事」的言論，和拒絕參與支聯會悼念活動的決定。

總言之，學歷較高、受西方思想影響較深的年輕世代，已不再如年長世代般「自求多福」，對政治缺乏興趣，甚至不敢接觸。因此，面對社會不公、自身權利受損時，年長世代多會逆來順受，年輕世代則會較積極地回應。

在區域重新整合與相對優勢逆轉中思考定位

香港雖經歷百多年殖民統治，但由於缺乏天然資源，門戶開放是發展的基石，香港與內地密不可分的社經關係，僅在1950至197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前陷於斷絕；然而，開放後20多年，兩地居民的流動基本上是香港人大量進出內地、內地人極少進出香港的「單向」格局，直至2003年推出內地居民赴港個人遊(俗稱「自由行」)政策，「雙向」交往始不斷成形：1997至2017年間，香港人往內地的人次由3,367.8萬增至7,980萬，內地人來港的人次由236.4萬增至4,444.5萬；兩者比例由14.2倍收窄至1.8倍(政府統計處, 2002:201; 文化和旅遊部, 2018; 香港旅遊發展局, 2018:8)，說明兩地互動已進入全新局面(鄭宏泰、尹寶珊, 2017)。

可惜人民增加接觸，反暴露了兩地因生活方式及思想價值有別而產生的矛盾，甚至引發各種難以預測的社會問題與政治紛爭，如在內地人赴港旅遊便利的情況下，「雙非嬰兒」數量飆升，牽動了產婦床位荒和小學學位荒等問題；又如出現連串抗議水貨客搶購奶粉和日用品的「光復上水」、「100萬人反對再擴大自由行」等集體行動；在互聯網上升溫的言論，如「蝗蟲論」、「香港不歡迎你們」、「滾回大陸去」等，更成為激化兩地矛盾的催化劑(鄭宏泰、尹寶珊, 2014a)。

更觸動香港人神經的是，在「中國崛起」的形勢下，香港與內地的相對優勢快速逆轉。回歸前，香港社經發展領先內地，

運用各種資源推動內地改革開放，乃香港人的驕傲。回歸後，內地經濟騰飛，香港的綜合競爭力不再一枝獨秀，經濟相對值顯著下降，如 GDP 佔國家總量，已從 1991 年的 23.2% 劇降至 2017 年的 2.8% (World Bank, 2018)；與此同時，隨着內地資金和遊客湧入，香港經濟命運對內地的依賴屢創新高，如內地投資佔香港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從 1990 年代末大約一成，增至 2006 至 2012 年接近四成，其後才回落至三成上下 (政府統計處, 2018b: 表 048)。經濟發展動力與實力的此消彼長，左右了兩地的互動和關係，年輕世代的心態與感受很可能亦受到影響。

在科技日新月異的全球化時代溝通表達

科技自 1980 年代以超乎想像的速度推動社會變遷，互聯網及智能電話的普及、信息和通訊技術的革命，以及社交媒體的流行，成為推動全球化和整合社交圈子的重要力量，令人際間、人與群體間的聯繫無遠弗屆，促進各式各樣的集體創作、表達和互動，甚至成為社會動員時成本較低、效果較佳，且能隨時隨地近乎全無阻隔地進行的媒介。

年輕世代成長於科技普及、社交媒體大行其道之時，加上教育水平顯著提升，自然有助他們對新傳播科技的掌握和應用，甚至被統稱為網絡世代、數碼世代；反觀年長世代，因生活模式及習慣大都如舊，較難適應新傳播科技，及其帶來的轉變，不但普及率較低，應用頻度和強度亦較弱。世代之間的數碼鴻溝，變得愈來愈深。

不少研究證實，不同世代有截然相異的媒體使用習慣：年輕世代最常接觸社交媒體，其他世代則仍是傳統媒體。由於兩種媒體所展示的社會資訊愈趨分歧，透過不同媒體接收資訊，會令使用者對社會產生不同的觀感，包括國族認同感：最常接觸社交媒體者，對中國標記 (包括解放軍、國旗、國歌、普通

話和萬里長城) 的自豪感，明顯低於最常接觸電視或報紙的人士 (馮應謙、馬傑偉, 2014)。

我們曾在 2013 年詢問香港人有否利用社交媒體瀏覽或討論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新聞，亦發現年輕世代使用社交媒體的頻密程度，顯著高於其他世代：青年、中年和年長者之中，經常使用者，各佔 15.6%、9.1% 和 4.9%；間中使用者，各佔 54.0%、30.2% 及 16.0%；從來沒有者，則為 30.4%、60.7% 和 79.1%。由此可見，就算在了解兩地關係這些大眾較不感興趣的「硬性」課題上，利用社交媒體的頻度和強度，仍以年輕世代較強 (鄭宏泰、尹寶珊, 2016:71-72)。

在資訊爆炸和科技革命的年代，社交媒體不但改變使用者的生活模式、人際關係和價值觀念，亦成為左右民意、輿論和政治的重要工具，中東、北非、東歐，乃至台灣、香港等地，近年出現一浪接一浪的「顏色革命」與社會運動，便清楚展現了社交媒體的威力，年輕世代成為這些運動的主角，他們走在時代的浪尖，足不出戶即可聯繫世界和連群結黨，將仍依賴傳統媒體的年長世代拋在後頭，難怪有學者指出，這是「新傳播平台拉闊世代鴻溝」 (蘇鑰機, 2014)。這樣的結果，難免進一步擴大彼此在生活經驗、人生目標和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

由此可見，在巨大社經和政治變遷下成長的香港新青年，人生、家庭、學習、事業，乃至家國觀念、政經信念和道德價值等，已呈現與年長世代迥異的變化，並產生如下值得關注的現象或問題：

一、生活條件顯著改善，經濟順利轉型，競爭力得到強化，促使年輕世代追求更高層次的滿足或成就，其中以爭取民主、提倡保育最受重視。但在近年貧富日益懸殊、經濟增長放緩、競爭力下滑的情況下，年輕世代對分配不均、社會不公、前景不佳的觀感，均較年長世代強烈。

二、家庭規模不斷收縮，教育水平持續上升，年輕世代成

為家庭和社會的天之驕子，他們的人生目標、理想及價值觀念自然發生變化，而科技突飛猛進與全球化浪潮加劇，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廣泛利用，既給年輕人帶來更多機會，又迫使他們面對嶄新挑戰，由此產生的張力、壓力與衝擊，實不容低估。

三、社會急劇轉變，政治議題不再遙不可及，並已進入民眾的日常生活，引起社會高度關注。香港已邁出民主腳步，年輕世代議政、論政和參政的熱忱日益高漲，社交媒體已成為他們收發資訊、月旦時事及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媒介。

四、區域互動的格局發生巨變，年輕世代對內地的親近感、機遇感，已不如年長世代般強烈，他們的國家觀念，更與其他世代背道而馳，凸顯了年輕人視香港為家的感受，對內地的隔閡，正不斷強化。

小結

《新青年》雜誌於1936年再版時，蔡元培贈送了「時代之急先鋒」的題詞，其中的「急」字可圈可點。無論是行軍打仗或是帶領群眾前進，「先鋒」都屬於褒義詞，帶有先遣人員、引領風氣的意思。但加上一個「急」字，則寓意深遠，原因是該字有躁動、倉卒、欠缺深思細慮的意味，憑蠻勁往前衝，或只考慮一個角度，未能兼顧後方或全局。

蔡元培當年用「急先鋒」形容「新青年」，背後所指為何，這裏不作臆測。若從生物學角度看，青年確有充滿活力、兼具衝動傾向的特質。心理學或人類學則視青年為人生發展歷程中的「過渡階段」，角色、身分及地位等尚未完全建立，在思想和行為上表現得較為波動與不安，有時甚至做出反建制、反傳統和反社會的行為，因而容易與年長世代格格不入。但是，隨着年紀漸長、人生經歷漸豐，青年會逐步走向成熟，個性也會漸趨穩重，之後融入社會，與年長世代同思想、共進退。

雖然如此，我們同時不能否定，於不同時代環境下成長的

青年，在人理想、價值觀念或是思考模式等方面，難免存在與之前世代相異之處，進而影響他們對家庭、事業、婚姻、社會、國家和民族等的看法。自1998年以來，香港亞太研究所每半年進行一次隨機抽樣的全港性民調，本書以下各章將運用這些調查數據，從年輕世代在立場和看法上到底與其他世代有何異同的角度入手，¹⁶了解他們對香港社會發展的感受和態度，希望對梳理當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提供有用的參考。

16. 我們按受訪者年齡和調查年分，計算其出生年分（即出生年分 = 調查年分 - 受訪者年齡），然後劃分為「八、九十後」和「其他世代」兩個組別，前者出生於1980年之後，後者於1980年及之前。